

三联评论



主编 吴士余 倪为国

写实与浪漫

俞兆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三联评论



1209.6/89

主编 吴士余 倪为国

写实与浪漫

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

俞兆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03024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俞兆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三联评论)

ISBN 7-5426-1611-0

I. 写... II. 俞... III. 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研究

IV. I 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570 号

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

著 者 / 俞兆平

责任编辑 / 吴士余 邱 红

封面设计 / 姜 明

责任制作 / 钱震华

责任校对 / 李玉英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anlian @ online.sh.cn

印 刷 / 江苏常熟市第四印刷厂

版 次 /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01 千字

印 张 / 5.625

印 数 / 1—3100

ISBN 7-5426-1611-0

I·182 定价 10.00 元

十多年前,陈昕先生主持策划了上海三联版的经济文库。经四五年的努力,陆续推出了经济学术系列、经济学译丛系列近百余种,其不少著述至今仍在经济学界产生着影响。列入文库的作者林毅夫、樊纲、胡汝银、潘振民、史晋川、王新奎等均已成为著名学者或学科带头人。新闻媒体曾以“三联经济学派”的美称表示赞赏。姑且不论“学派”之称是否恰当,这毕竟是出版理念的一种创意。

跨千年之际,笔者又重新回到人文社科的出版岗位,主持上海三联的编务。接盘伊始,便有一个意愿,企求能为繁荣、活

跃中国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策划《三联评论》拟可视为上海三联出版理念的延续。自然,学术命题已不局限于经济学,将广伸到文、史、哲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王元化先生曾对目前知识界、教育界存在的“注重理工科、重实用,而轻文史哲”的倾向表示担忧,后者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三联评论》的任务是将学界精英及中青学人的成果推向学界和公众社会。这一理念得到上海三联同仁的一致支持,为此,我感到欣慰,并充满着信心。

策划《三联评论》的初衷是旨在活跃学术文化。学术的本质意义是科学、是知识。作为学术研究,学术思想的探索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品格。不否认,任何时代的学术文化都渗透着部分或局部的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也因不断吸取新的、优秀的学术思想而显示其活力,但学术文化毕竟不是泛义的意识形态,它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三联评论》丛书所追求的,是学术的原创性和多样化,鼓励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价值的学理知识,充分显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理性,在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范的秩序下,倡导学术文化的自由。这也是我们确定丛书基调的出发点与归宿。

鼓励有思想的学术,不仅仅是指学术理念、学术伦理价值和学术文化构建,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的创新。我们不准在词章考据、文字训诂的传统学术方面开拓出版疆域,而是注重提升知识与思想之间的建设性张力,注重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因此,收入《三联评论》的著述,可以是前沿性的思想文化研究,也可以是边缘性的学术探索;精英学术文化与大众学术文化并存,国学与西学互补;既欢迎某一领域的学理创新,也欢迎多元文化话语对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美学的讨论;学术思维方法不拘泥统一,实证的、微观的、宏观的,兼收并蓄。但有一点是强调的,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应作为出版价值判断的依据。

学术著作出版的创意,还想在文本及形式上作些尝试。我们将《三联评论》限定在8万到10万字的学术著述。相对皇皇宏论而言,它们只是“微型学术著作”。这是希冀学者将某一命题研究的精华熬成一书,在简约的著述中凸显其学术思想的含金量。这一出版理念也是想矫正90年代以来盛行学界的空疏、矫情之风,重树“理精而义明”的务实学风,以匡正文化消费主义、商业世俗化侵蚀学术而导致的浮夸与焦躁。求短、求精、求新,将是《三联评论》这一品牌的定格。现收入丛书的,既有学界名流的精品,又有新进学人的力作。正是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才使策划人的意图得以实施。

编辑《三联评论》将一以贯之三联的出版传统。这就是三联创始人韬奋先生所提倡的,“文化的继承和时代的创新”。我们将把《三联评论》视作学术新人的一块园地,即使有的著述还不够成熟,但只要有一点建树和突破,我们都表示欢迎。同时,学术研究作为科学知识,有着自身的价值基准和游戏规则,对一家之言,也将持宽容、尊重的态度。有位学界朋友说得好,“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世界主义化过程。”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耕耘和建设,应该是开放

性的、前瞻性的,决不能抱残守缺、拘泥传统,自然也不提倡抛弃传统。构建多元的、适应全球化的中国学术文化体系,将世界意识渗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应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态势。这也是《三联评论》努力的方向和应尽的责任。

王元化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时,对学界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希望:“学界不要让世纪末的时尚口号和花哨的旗帜所遮蔽,使相互认同产生障碍”,“要沉潜于自己的专业,为迎接新世纪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拿出真东西来”。我和上海三联的同仁将以先生的希望自勉,执着、努力,为社会多出版一些优秀的学术著述。

吴士余

2000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科学主义语境中作家的选择

「科玄论战」及其影响

科学主义的文化语境的形成

第一章 科学语境与作家选择

科学主义角度的突围

重写文学史的困惑

绪论：困惑与突围

5	13	26	31	36

后 记

附录：作者发表的有关本专题研究的论文目录

隶属思潮的范例

逆转接纳的原因

惯例习俗的接受

本质定性的偏离

难以消解的困惑

第三章 科学主义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

唯物史观基点上的写实主义

从人生论，到唯物论

是进化论，还是科学论

写实主义概念的提出

第二章 科学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

58 65 81 100

114 122 131 140 146

159

161

自 序

1926年11月1日夜,鲁迅在厦门大学集美楼上寓所写下这么一句话:“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我们现在的系会议室就在此寓所的隔壁,日常来去,总有一些沉甸甸的感觉在心间。“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这句应为厦门大学中文系的“祖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传承,不好妄加评论,但对于我自己来说,却时时记得,奉为铭志。

学术研究的“原创性”,说来容易,做起颇难。就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其时

间跨度仅 30 年,积留下的资料也已基本公开化,特别是近 20 余年来,在成千上万人,尤其是高校的研究生,无休无止地发掘、爬梳之后,还能留下什么新东西呢?以至于连“鲁迅与计划生育”的题目也有人动笔。于是,类似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的阴影似乎也笼罩着这一界域。研究的现状就是如此地严峻,你还能折腾出什么呢?

但处在“围城”中的人,又有谁能和职业设定的规则相抗衡呢?因而,你只能往前,不能后退;只能拓展,不能重复。在这一染有苍凉意味的心境中,在一次与文友长谈的过程中,我忽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一角新的界域在召唤着。近年来,“现代性”的课题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作为“现代性”构成要质的“科学主义”问题也逐步展开讨论,像哲学界对 1923 年“科玄论战”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关系的再度审视,像史学界对“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的重新发掘等。那么,文学界呢?相比较之下,在这一向度上几乎是一片沉寂,一片空白。就“五四”精神的两大要质——科学与民主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民主思潮和“五四”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得比较深入,但对科学思潮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则涉及较少。应该说,这一视角具有进一步拓展的研究价值,

有可能“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

历史的叙述内隐含着理论的预设,史实与学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从单一的、既定的意识形态认可的框限中解脱出来,加以全方位的重构。而人文精神与科技理性对峙的巨大的世界性的历史语境,使这一论题的展开具有全新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五四”时期两大文学思潮——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和历史语境中,显现出了新的内涵和意义。这些如若在而后的论争中能获得学界的认可的话,那么,它有可能为“重写文学史”,为文学思潮流派的重新定位,提供有益的思考。

诸如,西方的写实主义何以能为中国文学界所引进和接纳?写实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中国的写实主义如何能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接轨?又如,为什么创造社主要成员在1930年之前对浪漫主义均持回避、贬斥的立场,我们是相信史实,还是相信后人的判断?崇奉科学主义的创造社能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文学社团吗?浪漫主义的反科学主义的内质,在中国崇尚科学主义的语境和苏俄特定的政治需求中,如何被扬弃,产生怎样的变异?趋近、隶属于思潮性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指向的中国现代作家应是哪些人?这一系列问题,都将在新的理论视角与历史语境中,得到新的解答。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一节中论及:“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在此科学精神面前,传统“经学”的“子曰、诗云”一类既定大前提之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而从“疑”至“信”,在于是否有可“信者”,即我们所说的“证据”。胡适欣赏戴东原,原因也在于此,这也就是胡适说的“有证据的

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的意义所在。

因此,论述角度的展开,不能仅靠预设的理论前提演绎式地推导。这种论述方法的失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热潮中,已有过教训。特别是新的观点的提出,若不以史实为证,不是“拿证据来”,必定寸步难行。在新的世纪的开端,重读《胡适口述自传》中的这段话,尤有感慨:“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与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那儿,我们就跟到那儿。”人文学科研究中某一种方法或精神重现与复归,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因此,史实的实证、历史语境的纳入,成了本书写作所遵从的要旨。当然,由此也带来了披沙拣金的繁难,筚路蓝缕的艰辛。对史料的寻找,劳而无获是常有的事;而对史料的阅读、取舍、组织、征引等的劳作,在一些人看来是愚不可及的,是不合时宜的。但正是在这艰难的寻觅中却时时充溢着新的发现的喜悦,因为有可能“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了。或许,这便是我们的生存的状态,我们的命运吧。

作 者

2001年6月30日

重写文学史的困惑

1988年，上海文论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课题。迄今10余年的时光过去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最能显示这一“重写”课题业绩的，是1998年7月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出版。随之，《文学评论》为其组织了一组笔谈——《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钱理群、洪子诚等4人或谈了个人的感想，或作出了评价。

洪子诚的评价是中肯、公允的。他认

为,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那一时期的现代文学史,主要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方法论依据,政治经济革命对于文化革命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这一类文学史观的核心。因而,这类史著内涵基点有二:一是“等级性”,按阶级分析的尺度,把不同性质的文学类型编排为等级的序列;二是“过渡性”,因现代文学必须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所以它比起当代文学来说,只属于过渡性质的文学。到了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便与独断的等级划分方式拉开距离,现代文学成了“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现代追求”呈现出复杂与多样的性质,因而过去被压抑、遮蔽、疏漏、清除的文学现象,重新挖掘、显露出来,并放置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这是一部“有很高学术质量的史著”。

但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作为本书主撰者之一的钱理群却没有丝毫高兴的心态,他说,他“是从堂吉诃德转向了哈姆雷特”,脑子里充满了“问题”与“疑惑”,“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钱理群的坦言与真诚是近年来学界罕见的现象,令人涌生由衷的敬佩之情。那

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按他的这篇《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章所指出的,关键点在于:

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①

由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引发了他对现代文学研究一系列问题的追问:(1)如何从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2)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3)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及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4)如何认识与处理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以及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5)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6)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

的确,“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也就是说,钱理群的追问和思考,已不再是以往“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所偏重的增加或删减某些作家、作品、流派的“加减法”了,已不满足于上述那种“等级性”、“过渡性”的调整

①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48页。

了,而是从更宽阔的视野、更深层的脉理着眼,特别是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纳入了全球性、跨学科的“现代性”研究的范畴中,这无疑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困境中突围的信号。

这就是说,当前若要相对完满地解答类似钱理群所提出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解决的途径应从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视角进入,这样才能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突破僵滞的形态,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拓展,从“重写文学史”的困惑中突围,突破点也在于此。早在1986年,王瑶先生在《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就多次提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趋向:“由于痛感自己思想文化的落后,要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思潮,当然也要求文学具有现代化的特点。”^①虽然,这里的“现代化”在内涵上与钱理群的“现代性”不尽相同,但客观上看,其内在思路应该说是有所接近的。在这一思路上所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呼应了这一现实的需求,具有了开拓性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如若从“现代性”的角度予以新的审视、

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纳入了全球性、跨学科的“现代性”研究的范畴中,这无疑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困境中突围的信号。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它是人们对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的理论概括与价值判断。

^①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